

书评菱田雅晴编著《中国——基层社会管理》

江口伸吾
(岛根县立大学教授)

- ◎ 原文刊载于「日」『中国研究月報』中国研究所、第 67 卷第 4 号, 2013 年, 36~37 页。
- ◎ 袁广泉 译
- ◎ 原书为菱田雅晴编著『中国—基層からのガバナンス』法政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324+9 页。

本书围绕近年来中国政治社会的变化, 从党、国家、社会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多视角的实证性考察, 探究了坚持一党统治体制而又富有变化的中国政治对社会管理、驾驭(Governance)的实际状况。编著者在该领域曾有开拓性研究成果问世, 而本书则是邀集国内外学者, 就“如古罗马的雅努斯神(Janus)那样呈现多种面貌”(第 323 页)的现代中国结构性变化的现实进行共同研究的结晶。

本书由序章、第 I 部《协调主义(Corporatism)的可能性》、第 II 部《区域社会管理的苦恼》、第 III 部《国家管理的摸索》、第 IV 部《党、国家、社会的抗衡关系》及尾章组成。所收各文作者以实证手法, 在兼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同时, 依各部主题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 并为理解当下日中两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状况, 就其争论要点进行了分析。

序章《自律社会的管理——草根阶层的视点》(菱田雅晴)提示全书课题和研究方法。该章重点论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正处在走向自律的过程中, 而国家和社会对此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再次确认了著者的一贯立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是以“共栖”为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 该章介绍了本书的研究目的, 即尝试从多角度探讨基层(即“草根”)社会变化的实际状态。

第 I 部, 《中国协调主义现状》(石井知章)和《中国协调主义趋势——基层工会主席调查数据分析》(小嶋华津子), 应用着眼于国家与利益集团相关性的协调主义(Corporatism)理论, 对中国的工会组织进行探讨。文中把工会定位为国家协调主义, 梳理了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并运用对基层工会干部所作问卷调查数据, 论述了自律性社会协调主义是否可能。

第 II 部, 《结构转换时期的党政精英与区域社会——四川省 SH 县问卷调查》(南裕子、中冈 Mari)、《农村社会的凝聚力——湖北省 S 县“公共生活”个案研究》(阿古智子)、《“权力与利益结构网络”与农民表达群体利益之困境》(吴毅)等文, 探讨了区域社会的管理问题。这些文章重点关注“县党政精英、中间群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镇干部、企业经营者)和民众”之间利益表达的过程、由经济利害关系及社会资本交织而成的农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及“权力与利益结构网络”。除制度外, 更多地重新审视其与非制度性的人及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 并考察区域社会管理的特点及问题。

第 III 部之《由听证制度看政治参与扩大的实际状态》(唐亮)、《互网络信息与政府监管——“政治性”互网络信息的安全认知》(白智立)、《城市基层政府与 NGO 的合作——打工者在“社区”的 NGO 活动调查》(赵秀梅)各文, 则针对国家管理的变化作了探讨。这些论文就 1996 年引进的听证制度的理念与运作间的差距所反映出的政治参与扩大的现实、政府与互联网用户对已渗入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互联网信息安全意识的非对称性、城市社区打工者等问题,

考察了居民委员会与 NGO 共同提供的公共服务，及其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第三域（Third Realm）”的可能性。

第IV部之《社会性“泄愤”事件与社会管理困境》（于健嵘）、《SARS 危机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政治力学》（吴茂松）、《加强执政能力与党内民主》（王长江）各文，探讨了党、国家、社会间的关系。该部分关注并论述的是，以偶发性、散发性、利用手机和互联网等从事犯罪为特点的“社会性‘泄愤’事件”及其所反映出的群体性争议事件、2003 年 SARS 危机暴露出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的漏洞及社会管理由国家垄断向国家与社会协作的转变、基于对民主错误认识的反省而实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基层民主改革的动向等。

尾章《悄然迫近的危机——党的组织问题》（菱田雅晴）则聚焦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社会团体，探讨其面对组织能力衰减危机而建立自律秩序形成体制（morphogenesis）的步骤及可能性。

上述各文，无疑将加深我们对现代中国基层社会横跨党、国家、社会的多层次管理实际状态的理解。如关于工人的动向，本书认为，党和国家对工会依然拥有巨大影响，但同时也应综合考察制度外部的“信访”、罢工、游行等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动向（第I部）。换言之，这些论文为我们呈现了中国政治社会的如下现实，即在党和国家单向统治的局限与各种社会自律性要素之间，需要通过制度性及非制度性的多个回路来实现双向性社会管理。并认为，考虑到处于管理顶端的共产党本身亦将被迫发生内在改变，故对共产党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其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而非仅探究其政治领导地位和制度。

本书各文对理解上述多层次管理的结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仍有一些问题未曾触及。其一是，如何在整体性中定位源自地域性的多样性？“模式”是中国经常应用的概念之一，因其反映政策意向，故用作分析概念并不合适。但面对中国广袤的地理环境，的确需要以某种模式来分析其社会现象。本书所作个案研究，对地域性有明确提示，但却极少比较各地域之间的异同。当然，这不在本书研究范围内，但的确不可忽视。

其二，有关城市和农村的社区建设，近年人们经常讨论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新型“第三域”；但其规范性应作如何定位（第III部）？“第三域”是把握中国实际状态的概念，不一定含有规范性。但观诸以前国家与社会间关系，尽管该概念源自欧美的历史经验，但的确含有如下视点，即试图通过将国家相对化的社会自律性来保护市民的生存和权力免遭国家与生俱来的暴力干涉。胡锦涛于 2007 年 7 月曾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据认为党和国家亦将主动进行民主改革（第IV部）；那么，“第三域”到底能否具备中国特有的新的规范性？在今后的个案研究中，这个问题应予以持续关注。

近年来，对本书提起的课题骤然引起人们极大关心。围绕一系列事件——始自广东本田汽车零部件厂的工人罢工（2010 年 5 月）、该省乌坎村干部贪腐激起村民游行抗议（2011 年 9 月）、《南方周末》删改报道文章导致记者和市民抗议（2013 年 1 月）等——而采取的危机管理措施引发争议，今后也还会发生。本书从党、国家和社会间关系分析基层社会管理，从而为考察此类现象提供了有效视角。